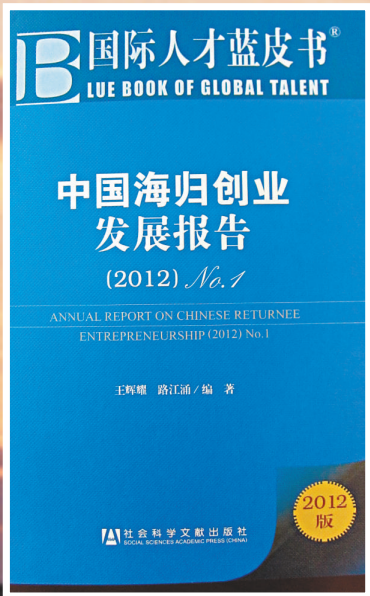


往返於東西方之間

海歸中的海鷗



海外留學「花名」錄

- 海龜：海外歸國留學人員。
- 海帶：歸國留學後暫時待業者。
- 海草：因學歷背景不高、難以找到好工作的海外歸國人員。
- 海鷗：頻繁往來於國內和海外的留學人員。
- 海派：海外跨國公司或海外機構派遣回國，擔任駐華機構代表或中高層管理人員。
- 海獅：「海歸」中的權威者、大師級人物。

小資料

「海鷗」面面觀

研究表明，海鷗具有以下特徵，高學歷、大多數碩士以上；具有海外工作經驗、往往在主流社會機構中擔任要職。《中國海歸創業發展報告（2012）》認為，「海鷗」擔任中國海外企業高管，將大大縮短中國企業國際化的進程，成為中國企業海外長期穩定發展的解決方案。

「海鷗」的核心優勢來自這一群體的兩棲型特質，即同時認同移民所在國和祖籍國，可同時利用兩地的機會和資源。由於他們的優勢在另一個體制形成的，其最佳發揮可能還在海外。因此，他們完全歸國既不現實，也會因重返國內體制喪失自身價值——國外的社會資源、決策與執行效率等。以「海鷗」形式為國服務則避免了兩種體制的摩擦，使認同祖國利益的海外華人沒有後顧之憂。

專家之見

提供更多便利 鼓勵人才流動

根據海歸創業報告，70%接受調查的海歸認為國內的戶口檔案限制過多。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輝耀對大公報表示，全國人大常委會剛剛通過的出境入境管理法增加人才簽證的類別，可視作便利「海鷗」歸國的舉措，但這與印度、越南、韓國等多國面向僑民實施的普惠制政策相比，力度還小得多。

「比如印度就發放了400多萬的海外公民證和700多萬張印度裔卡，讓印度的海外人才享有免簽證等政策，大大加速人才的回流和環流。」王輝耀舉例說，與中國為海外人才設置優惠政策吸引他們歸國創業相比，印度沒有花很多的錢來吸引人才，但普惠制的政策卻讓印度的海外人才回歸率高於中國。

他強調，中國正處於轉型階段，人口紅利逐漸消失，要讓人才紅利盡快發揮效應，這方面應當利用好「海鷗」。「在全球化時代，提供來回的便利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中國不流動起來而別的國家流動，吃虧的是中國。」王輝耀指出，在香港人才可以自由流動，不管人才拿什麼國籍，都是特區公民，這是香港發展佔優的主因之一。現在這樣的優惠政策也應當惠及到大陸來。「當然現在談雙重國籍很敏感，但完全可以採取折中的方案，在簽證政策上給海外的人才往來的便利，方便他們回國投資創業、出國尋找創意、帶領中國企業走出去。」

王輝耀建議，中國還應設計更多利用海歸的項目，如針對專業人士的短期交流、諮詢、顧問項目。開辦更多國際學校，提升教育的競爭力，把中國的人才和國外的人才都留下來。

「在歐洲生活了16年後，我又回到了熟悉而陌生的北京工作。」15歲起隨外派的父母到德國定居，在德國從中學一路讀到碩士後，又在法蘭克福工作了8年，31歲的時候，陳棟（化名）作為德國某大型銀行的中國首席代表被派駐回北京工作，一呆又是6年。事業穩定上升之餘，對生活方式的選擇、個人的歸屬感以及身份認同，陳棟卻難免迷茫。

擁有德國的永久居留身份，同時每三個月固定返回德國、業務跨越中德，陳棟是「海鷗」的一種典型代表——根據《中國海歸創業發展報告（2012）》，如今中國的海歸人才已未必徹頭徹尾地成為「海龜」，他們中有超過四成的人擁有外國國籍或永久居留權，往返於東西方之間是他們工作和生活的常態。因為長期在國內外飛來飛去，他們被形象地稱為「海鷗」。

【本報記者 隋曉蛟】

隨時問自己在哪安定

在SPR COFFEE見到陳棟的時候，他穿着馬克華菲的格子襯衣、背着黑色的雙肩包，一身休閒打扮與記者設想的銀行高管形象大相逕庭。熟練地為自己點了一瓶蘇打水，他講起自己身為「海鷗」的得與失。

「小時候的北京天很藍，站在家裡的陽台上就能看到西山。而現在即使天氣晴朗也不容易看到山了。到處是霧濛濛的，像是與國人的談判，找不到頭緒。又像是東方的文化，你能感覺到它，可是你總抓不到它。」雖然操着一口流利的京腔，陳棟坦言自己在國內遭遇到文化困惑，「語言是兩個層面的，你可能說的很流利，但「聽話聽音」，有時候你去談判很難理解人家背後的意思。」

回到故鄉水土不服

他告訴記者，相比之下西方的文化讓人變得很直接，無論說話做事都不用拐彎抹角。「我不敢妄自去評論哪一種文化優於另一種文化，只是注意要入鄉隨俗罷了。這種每天多變的思維讓我不禁接着考慮：我屬於哪，哪一種環境更適合於我？」陳棟說，這個問題對於像他這樣的「海鷗」絕不簡單，因為他到國外的年齡已經過了被培養成香蕉（指外表黃皮膚內裡白人思維）的年齡，但被帶着西方文化的水、土壤、肥料培育出來，再被重新放回東方的菜園內，又會有些水土不服。

這種感受，在他自己創業的過程中體驗得尤其深刻。「在國外辦公司是非常簡單的，如果一個政策寫在紙上，你把所有手續準備齊全事情就可以落實了。可在國內，所有的註冊都非常複雜，雖然已經進步了很多，對海歸們也有不少照顧措施。」陳棟說，這可能與中國高速發展的現狀有關，一個部門出台新的政策，其他落實的部門還沒有拿到解決方案，他們之間也會有矛盾，這種情況其實挺多的。

「剛回來的時候很多事情我都不能適應，比如缺乏環保意識的隨地吐痰、沒有排隊習慣的社會秩序……」陳棟說，後來自己也理解了，可能是因為空氣質量不高讓患呼吸疾病的人比較多，人太多讓大家缺乏等待的耐心。

國內成家成本太高

雖然接近不惑之年，陳棟並沒有成家。「年輕的時候也有過女朋友，但當時沒想那麼多。再說我比較傳統，希望找個中國女孩。」如今想到結婚，他卻覺得是件太現實的事。「在國外生活的質量比較高，但是發展的機會沒有國內這麼多。可是在國內成家、結婚、生小孩，成本非常高。」他解釋，因為自己在國內沒有什麼「關係」，想到搞定這一系列事情的難度就發怵。

「我現在每三個月回去德國一次，主要是出差、度假、探探朋友。」熱愛登山和攝影的陳棟講起阿爾卑斯山的雪山、牛群、鮮花、草原、小房子、小溪流充滿讚美，「去那兒度假真的是去休息，能夠放鬆下來更有精力地工作，這和國內逛景區的感覺不太一樣。」

因此，對陳棟而言做中長期規劃是個不小的困擾，「我隨時都在問自己，哪個地方更適合自己安定下來，朋友圈子、發展的機會，考慮的因素太多了。」

「移民後為什麼還回來？一是民族感情拋不掉，二是看好中國高速發展的機會。」目前在北京某外企工作的張先生講出了大部分海歸的心聲。但對陳棟而言，事情並非這麼簡單，因為不少海歸面臨的家庭、社交、文化認可等問題，在他這裡大多不成問題。

少小離家融入他鄉文化

陳棟的父母1989年即因公派出國，他也算是「隨遷子女」，因此沒遇到什麼家庭方面的障礙。而在德國定居的16年中，他也結交了不少至交好友——如果要數出五個最好的朋友，北京的「發小兒」算兩個，其他三個都是在德讀書工作的長期相處結下的深厚友誼。又因為轉入德國中學的班主任剛從杭州教了三年德語回國，陳棟融入新的圈子幾乎沒遇到多少困難。「我們老師特別喜歡中國，對我非常照顧，因為老師對我好，同學也刮目相看一些。」回憶起在德國成長的經歷，陳棟津津樂道。陳棟說，可能是因為年紀比較小，掌握語言也容易一些，自己認識朋友、親近當地的文化習慣都水到渠成。

在德國的學習、工作、生活都可謂「春風得意馬蹄疾」，陳棟卻主動選擇回國發展。「99年的時候，我就和當時的上司拿自己的假期到中國考察市場，當時覺得在國內發展得特別好。」兩個人商量着合夥把德國的技術拿到中國推廣，於是他得到了駐中國首席代表的安排，比較風光地回國工作。

引進國外優勢 找對接點

「外派的薪水加上額外的住房補貼，當時的收入作為一個Package肯定很高，31歲的時候我還挺不成熟的，總覺得人生的目標貌似已經達到了。」談到派駐回國的細節，陳棟顯得有些感慨，臨回國前，朋友都祝賀我，不僅讓在國外的國人羨慕，就連大部分「頭腦方方」的德國人也知外派是美差。只有一個經歷與我大致相同的台灣同學很不以為然，「像我們這樣的人，既不屬於西方，也不屬於東方。說好聽點兒叫做世界人，似乎得到國際化的精髓，說實在點就是無根可尋。現在好不容易在西方花十幾年的時間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怎麼居然又把自己放到另一個新環境裡重新來過？」

在國內做了幾年銀行的首席代表，陳棟感覺基金和投資並不是中國的前途，因此去年便辭職創業，轉向環保科技產業。「自己覺得還比較崇尚吧，做成功的話不僅創造企業價值，也能創造社會價值，環保科技也的確是德國的強項。」他解釋，國外看好中國市場，他所做的就是將國外的優勢引進國內，尋找對接點。

▼內地電視劇《海歸，海歸》其中亦描寫了「海鷗」的生活，圖為該劇劇照



游刃於兩種文化之間

另一位「海鷗」李沁則講得很坦白，「我肯定要在中美之間做事的，跨文化的背景是我很大的優勢。」因此，在美國電視界闖蕩七年並奠定專業地位的李沁自07年起選擇在中美之間開拓發展自己的事業，她在北京創辦的沁人心彩傳媒科技公司致力於為國家提供品牌國際化傳播的系統解決服務。憑着對中國和西方受眾不同心理需求及思維方式的理解，李沁游刃於兩種文化之間，因為能夠清晰地意識到「一個眼神、一個動作所傳遞出的不同意思」，她努力讓大家在差異中彼此理解。

「中文和英文講故事的方式是不一樣的，我習慣於接受這種不同，用他們聽得懂的方式講中國。」如今的李沁，每周都選擇中國的一個城市，把自己眼中這個城市的樣子、這個城市的過去和現在講給美國人聽，這樣的講述生態在美國也確乎擁躉者眾。

新一代華人華僑

「伴隨着全球化和加入WTO的進程，過去幾十年中國的製造業和國際貿易得到長足發展，但如今出口導向和人口紅利遭遇到瓶頸。」海歸創業發展報告主編、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輝耀對大公報指出，中國的發展曾經依靠兩億五農民的流動，現在應當依靠的是高層次、國際化人才的流動。「有這麼一批海鷗出現在全球化的舞台上，對中西方相連接發揮了很大作用。」王輝耀評價，「海鷗」為國家帶來新的理念、新的創意、新的技術和模式，而這批人的比例越來越大，是新時期華人華僑的來源。

「海鷗」在國內佔據了技術、創意、資本等高地，但並非扎根國內，是否會引發人才流失的擔憂？王輝耀認為，應正視海外留學人才傾向於留在海外的現實情況，人才環流總好過完全流失，因此，國家90年代起的留學政策即是「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

但國內對官員擁有外國籍的詬病和質疑卻讓「海鷗」們心存顧慮，採訪中記者接觸到的幾位不同領域的「海鷗」都坦承自己不願泄露隱私，哪怕他們是環保、科技、金融等領域的專業人才，也選擇低調或迴避。對「兩種身份兩頭佔好處」指責的擔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讓這一人才形態長期停留在概念階段，而中國對全球化的參與卻需要海鷗帶來的流動。王輝耀呼籲，「海鷗」的回歸是雙贏，對這一群體應給予更多關注和鼓勵。

